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1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1 ·

歷史·地理類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著

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李季著

上海書店

李季著

中國社會史論戰批判

01101211

本書據神州國光社1936年版影印

四 介紹並批評各種劃分中國經濟時期的說法……………100

一 關於陳邦國君的

二 關於郭沫若君的

a. 應用摩爾根的前史人類進化階段方式的錯誤 b. 應用馬克思的經濟史分期的錯誤

三 關於陶希聖君的

a. 關於中國社會（特別是自秦漢至清代）的性質問題 b. 關於秦漢至清代統治階級的問題

c. 關於儒法道墨等家學說的階級性問題 d. 關於前資本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革命特徵

的問題 e. 關於其他問題

附錄

對於胡秋原君所代表的杜布洛夫斯基和波卡洛夫等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迎戰……………四四九

a. 幼稚 b. 矛盾 c. 庸俗 d. 虛偽

序言

凡從前清國文老夫子手中經過的人大都知道他們對於學生——特別是所謂高材生——的作文的批語是如何的虛偽而誇張。記得我有一個同鄉作一篇秦始皇拿破崙合論，文字不過清順，而他所得的批語是：

『胸羅廿四史，目睨五大洲；太史公作史，兼才學識，韓文公爲文，起八代衰，作者固未遑多讓也，偉哉！』

像這樣肉麻的話決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實足以代表一般國文老夫子的傾向，這正是中國士子的誇大狂。

然這種誇大狂的傾向是一種畸形的發展，牠只向好的方面走，而不向壞的方面走。無論學生的文章怎樣狗屁不通，總可以得到『可以觀』、『清順無疵』或『流利如哀梨并剪』這一

類的批語。在這種風氣之下，學生們得到一個好的批語，雖未必『榮于華袞』，而得到一個不好的批語，却是『嚴于斧鉞』。當我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已是一個『高材生』，有一次的作文題目出自周禮（題目已不能記憶），我用心做了一篇自鳴得意的文章，不過偶然疑及周禮係偽書，有些不可靠。國文老夫子皮先生見了，勃然大怒，不獨將我所懷疑之點全部勾去，並且于給予零分之外，復打一個長批云：

「周禮晚出，聚議紛如，橫渠語錄，稱周禮爲的當之書。作者對茲古籍，輒肆猜疑，既破壞大聖人「信而好古」之風，尤易啓乖張者「離經叛道」之漸。論履霜以冰至，本應令「小子鳴鼓而攻」，姑略跡而原心，特扣去全部分數以警！」

皮老夫子爲防止其他學生效尤起見，特于發卷時大演其說：「四書五經都是聖人的微言大義，後生小子何得懷疑？因爲懷疑這些書，就是懷疑孔夫子，而懷疑孔夫子，便是「非聖無法」！試問你們何所矜式？」這樣的演說詞和文章前面的零分，文章後面的長批，對于我不止于冷水澆背，簡直是一種羞辱；我雖沒有哭泣，但整個的星期，心中萬分難過。從此以後，不獨不敢非議人

聖人的古書，並且不敢非議一切帶有古香古色的古貨。歷史教員說盤古開天地，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人皇蛇身九首，蚩尤銅頭鐵額，食沙石，能作雲霧——總之，凡他所說的一切古人奇蹟，不獨煞是有趣，不容易忘記，而且我都不得不信，也不敢不信，否則破壞大聖人「信而好古」之風，即不致被同學們「鳴鼓而攻」，但「嚴于斧鉞」的批語，全部分數的扣除和滔滔不竭的演說，都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我說出上面三段話，並不是信開口河地編小說，而是陳述過去的一種實際生活，表明一種學風。對於青年人具有何等偉大的勢力。我自中學到高師，再轉北京大學，一向是不肯疑古的。尤其是在北平，遇着拖長辮和著春秋大義（英文的）的英文教員辜鴻銘先生，變成他的「高足弟子」，更加强了我信古的力量。所以當文學革命初起來的時候，我是最反對而且最不肯理會這新東西的一人，直到我親自參加了五四運動，才改變向來的態度。因為這種運動實在過於偉大，牠和熱烘烘的大熔爐一樣，把我一向不敢疑古的毛病全都熔化了。我于是奔向新的一途，這就是說，趨入反古的一途，曾于十個月之內，譯出八十萬字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就是一個明

證。

不過我當時的反古和從前的信古一樣，係受了一種學風的影響，多出於隨聲附和，並非真有什麼真知灼見。後來留學歐洲四年，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淘養，對於一切學術上的問題，頗能本着自己的能力加以思考，而不肯隨便盲從。對於中國的古書和古史，也自然取這種態度，但就大體講，還是疑古的成分多而信古的成分少，因為這些東西多半經過後人的改竄，真的中間雜着多量偽的東西，實在不能不令人懷疑。

我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回國，考察國內的學風，疑古的傾向較前加甚。這種風氣起於所謂新文學運動，適之先生當然是其中的領導者，而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正是一個榜樣。梁任公先生在批評這部大著中，曾提出抗議道：

『胡先生的偏處，在疑古太過，疑古原不失為治學的一種方法，但太過也很生出毛病；諸君細讀這書，可以看出他一種自定的規律，凡是他所懷疑的書都不徵引（但有時亦破此例，下文再論），所以不惟排斥左傳周禮，連尚書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講古代史，若連尚書』

左傳都一筆勾消，簡直是把祖宗遺產蕩去一大半！我以為總不是學者應採的態度。」（見梁任公學術演講集第一輯八頁）

任公這種抗議本具有充足而健全的理由，可惜他自己是一個玄學家，不能利用現代的科學去治古籍，他雖自有其治學方法，但有許多地方，只是跟着適之先生走，所以一班青年學者對於他失去信仰，把他的話當作耳邊風而不以為意，這便是「以人廢言」了。

梁先生對胡著的批評，原係在北京大學哲學社的一篇講演稿，至一九二二年底才刊印成書，然異年五月六日，努力的讀書雜誌即發表了顧頡剛先生致玄同先生的一封信和按語。他在此信中根據幾部並非歷史的古書，如尚書、論語、詩經之類，提出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見古史辨第一冊六一頁）

的有名的主張，並在按語中總括地說道：

「如這封信裏所說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見同書同冊六〇頁）

到了六月十日，讀書雜誌復發表錢玄同先生的回信，更進一步了，信中說：

「先生所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意見，真是精當絕倫，舉堯，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傳說爲證，我看了之後，惟有歡喜贊歎，希望先生用這方法，常常考查，多發明。（注意這四字，他們是要無中生有地從腦袋中去『發明』——李）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後來學子不致再被一切偽史所蒙。我從前以爲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爲『俊』，大也。（山海經的大荒東經作『帝俊』）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中國底歷史應該從禹說起……今讀先生之論，證以長發和閼宮兩詩，方知連禹這個人也是很可疑的了。（見同書同冊六七頁）

顧先生所說的禹是怎樣的呢？他最初的見解沒有成熟，我們可徵引他和劉挾黎胡堇兩先生後來討論所得的結論如下：

「西周中期，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后土）其神職全在土地上，故

其神蹟從全體上說，爲鋪地，陳列山川，治洪水；從農事上說，爲治溝洫，事耕稼。耕稼與后稷的業混淆，而在事實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後可興農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觀念，故闕宮有后稷讚禹之緒的話。又因當時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與周族的祖先並稱，故禹的傳說漸漸傾向于「人王」方面，而與神話脫離。（見同書同冊一一四頁）

自顧錢兩先生這些新奇的偉論發表後，本來引起許多反響，但一班持反對論的人只能在幾部古書裏面滾來滾去，不能利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去相責難，以致不能克服他們。不僅是這樣，他們這一邊還有好些受過現代科學洗禮的人爲之助威，遂使他們的勢力愈加膨漲。第一個助威的人是哲學博士胡適之先生，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的一篇論文中說：

「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牠，虛心地試驗牠，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牠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見

同書同冊一九一頁

他于說明顧先生「這個見解起于崔述」並舉井田論的演進史爲之闡明後，即進而批駁劉揆先生的意見，末了，總括道：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

（見同書同冊一九八頁）

第二個助威的人是地質學家，丁在君先生，他于是年二月十一日給顧先生的信中說：

「禹治水之說絕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江尤其如此。」

「去年同揚子江水道委員會的技師 Pattee 君等同赴萬縣，他對我說，「就是要用現代的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石器時代的禹如何有這種能力？」

「我說禹是石器時代的人，因爲我們至今沒有發見夏代的銅器」（見同書同冊二

說：

同時顧先生又善于利用考古家的議論去幫助自己的主張，他有一次徵引適之先生的話

「發見灑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見同書同冊九九頁）

又有一次徵引王國維古史新證一二章的文字，尤其是第二章，作者舉出秦公敦和齊侯罇鐘的金文，證明「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爲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見同書同冊二六七頁）而顧先生則洋洋得意，加以附跋道：

「顧剛案讀此，知道春秋時秦齊二國的器銘中都說到禹，而所說的正與宋魯二國的頌詩中所舉的詞意相同。他們都看禹爲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湯與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們都不言堯舜，髣髴不知道有堯舜似的（注意兩種古物上沒有言及堯舜，就是沒有堯舜的證據——季）可見春秋時人對於禹的觀念，對於古史的觀念，東自齊，西至秦，中經魯，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

史書中說，「那時（春秋）並沒有黃帝，堯，舜，那時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樂，我這個假設又從王靜安先生的著作裏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據！（見同書同冊二六七頁）

上面各種疑古的說法，本來絲毫沒有理由（反駁批評散見于本書各處），不值識者一察。不意當斯時也，與顧先生互相唱和的玄同先生竟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把那個上自軍閥，官僚，資本家，學者，下至妓女，綁匪，叫化子，鴉三所心愛的「錢」字拋棄不顧，改姓「疑古」，藉以譁衆取寵；並且利用他的一點文字學的知識，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中將柳翼謀先生打得落花流水。豈止柳先生，就是「無名小卒」公羊先生，「董道士」，「許老爺」等等也全不在他的眼中（參看同書同冊二三一至二三四頁）。他頂着「疑古」的招牌，這樣橫衝直撞之後，告訴我們說：

「清代經師……正因為缺乏「勇于疑古」的膽量，所以「創獲」未免太少了。」（見同書同冊二三四頁）

這樣一來，一班所謂新漢學家或整理國故者是一時勝利了。顧先生把這些討論的文字編

成古史辨第一冊，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版，因書的傳播，使他們的勝利愈加發揚了。

可是他們于這種勝利之後，竟無以為繼，遂致不能繼續維持他們的權威。自他們推翻禹以前的一切帝王後，一般青年學子本來萬分熱烈地希望他們弄出一個頭緒，建設一部信史來。但適之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雖已立下古史的骨幹（參看同書同冊九七至九九頁），顧剛先生雖已于同時企圖建設信史（參看同書同冊九七和九九頁），不意繼古史辨第一冊而出現于各種報章雜誌上面的東西，仍舊是一些沒有頭緒的片段文字。迨古史辨第二冊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人們已大失所望，而繼此佈刊的古史辨第三冊兩厚本，更少人過問，因為語其內容，每況愈下，越弄越枝節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大家已經明白看出胡博士所領導的這一派人只能運用唯心而又淺薄的實驗主義，做做校勘的工作，至于建設信史的責任不是他們所能擔負的。同時顧先生也在『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這種口實之下，把他的終身事業宣佈出來了：

「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